

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及其理论探讨

[俄] 亚历山大·科罗廖夫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学院 亚洲研究院, 莫斯科)

[关键词] 俄罗斯; 国际关系学; 世界政治; 国际关系哲学; 国际趋势

[摘要]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国际关系学进入全面转型阶段, 其理论发展、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本文重点梳理 1991 年后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发展状况, 阐述俄罗斯学界关于建立“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哲学”两门新学科的理论讨论, 分析俄罗斯学者在探讨国际格局发展趋势过程中提出的新概念, 从而反映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探索的俄罗斯视角。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2826(2013)12-0064-10

1991 年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国际关系研究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况: 一方面, 俄罗斯国际地位的急剧下降大大改变了其在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对外政策等问题上的性质; 另一方面, 苏联社会科学的主导分析范式——马列主义趋于衰落, 导致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在理论发展上面临不确定性。这种状况促使俄罗斯学者寻找分析国际问题的新视角, 从而产生了俄罗斯特有的国际关系学发展模式^①。近年来, 齐甘科夫(П. А. Цыганков)、列别杰娃(М. М. Лебедева)、博加图洛夫(А. Д. Богатуров)、科索拉波夫(Н. А. Косолапов)、赫鲁斯塔廖夫(М. А. Хрусталев)、契什科夫(М. А. Чешков)、巴达罗夫(Э. Баталов)等俄罗斯学者

出版了一系列重要著作, 导致了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变化。本文旨在梳理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辩论的具体内容和分析概念, 反映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探索的俄罗斯视角。

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发展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出现了许多政治色彩宽泛且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立场和理论倾向。尽管俄罗斯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多, 但风格十分多样: 还没有走下学术舞台的老一代学者继续遵循马克思主义学说, 而在后

[收稿日期] 2013-08-29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科罗廖夫,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学院亚洲研究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与亚太问题研究。

^① 参见刘再起:《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第15-20页;[俄]巴·阿·齐甘科夫:《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现状与前景》(冯玉军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5期,第1-17页。

苏联时期开始自己学术生涯的年轻学者则积极探索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与此同时,新老学者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影响也显而易见。就目前实际状况来看,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学仍处在转型阶段,难以划分相对独立的理论流派。

大多数俄罗斯学者认为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主要理论流派是现实主义^①。但与西方现实主义相比,俄罗斯的现实主义版本代表着相当混杂的学术思想。俄罗斯的“现实主义”学派可以分为“历史政治学”、“政治经济学”^②和“国际关系社会学”等分支。其中,“历史政治学的现实主义”分支又可分为二战后形成的“系统历史学”^③、“结构分析”^④和“地缘理论”^⑤三个研究方向,而“国际关系社会学的现实主义”可以分为“国际关系哲学”^⑥、“国际关系社会学”^⑦和“政治心理学”^⑧三个研究方向^⑨。总之,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流派是许多不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集合,其研究范围非常宽泛,

理论研究无所不包、数量繁多,没有像西方学界那样形成系统、普遍、成熟和完整的理论体系。

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未形成独立的理论流派。从研究方法看,所谓的“自由主义流派”实际上普遍使用结构现实主义的研究逻辑:强调国际政治的体系性,用结构变量解释国际现象,过于反对“权力”和积极主张国际规制的“民主化”,从而承认“权力”的重要性。而从论述逻辑看,所谓的“自由主义流派”学者通常夸大“普世道德价值观”及其对世界发展的作用,贬低个体国家的利益追求,而强调国际法的重要性。因此,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流派是否存在值得怀疑^⑩。同时,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被某些学者视为“只能描绘未来国际关系的理想图景,在最近10年内对分析国际问题并没有做出现实贡献”^[1]的研究方向。

围绕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讨论源于博加图洛夫在2000年发表的《十年范式探索》一文。博加图洛夫认为,大多数研究存在着理论

① 大多数俄罗斯学者都同意这一点,参见:П. А. Цыганков,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шко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в России // Кокошин А. А., Богатуров А. Д.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теория,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прикладной анализ, глава 4; Богатуров А. Д.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тенд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те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та. 2003, Сер. 18, №3.

② 政治经济学流派主要以伊诺耶姆契夫(В. Л. Иноземцев)、阿方契夫(С. А. Афонцев)、什什科夫(Ю. В. Шишков)、米利安契夫(В. А. Мельянцева)为代表。

③ 以赫鲁斯塔廖夫(М. А. Хрусталев)、巴兹尼科夫(Э. Я. Поздняков)、科科什(А. А. Кокошин)、阿尔巴托夫(А. Г. Арбатов)、巴兰诺夫斯基(В. Г. Барановский)等为代表。

④ 以列司涅(Л. И. Рейснер)、西莫尼亚(Н. А. Симония)、契什科夫(М. А. Чешков)、霍洛斯(В. Г. Хорос)、博加图洛夫(А. Д. Богатуров)、维诺格拉多夫(А. В. Виноградов)等为代表。

⑤ 以克罗索夫(В. А. Колосов)、米拉涅科(Н. С. Мироненко)、查玛金(Д. Н. Замятин)、科契托夫(Э. Г. Кочетов)为代表。

⑥ 主要以费德曼(Д. И. Фельдман)和巴达罗夫(Э. Баталов)为代表。

⑦ 以莫斯科大学齐甘科夫(П. А. Цыганков)为代表。

⑧ 以列别杰娃(М. М. Лебедева)、科索拉波夫(Н. А. Косолапов)为代表。

⑨ 参见博加图洛夫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流派》一文里提出的分类。详见:Богатуров А. Д. Тради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еализма в те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России // Кокошин А. А., Богатуров А. Д.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теория,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прикладной анализ. М.: Э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2002, глава 7. (available at: http://www.obraforum.ru/Mirovaja_politika/titul.htm)博加图洛夫承认这种分类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流派分类,而只是对目前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一种梳理。

⑩ 关于俄罗斯自由主义流派观点不一致,巴·阿·齐甘科夫(П. А. Цыганков)认为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很兴盛,包括“国际干涉论”、“有限主权论”、“国际社会论”,见Цыганков П. А. Либер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те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 Космополис, № 4 (6), Зима 2003/2004. 同时博加图洛夫(А. Д. Богатуров)主张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实际上缺乏理论根源。

知识与实证资料脱节的缺陷,年轻学者所学的西方理论知识完全独立于他们处理实证资料的工作。博加图洛夫并不乐观地指出:“现在的学者简直把本土现实‘译成’西方读者和资金提供者能够理解的语言”。^[2](P195-201) 这种贬低俄罗斯国际关系研究的做法遭到了很多研究者的批评,由此引起了关于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状况和发展路径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一些人强调西方理论不可能完全回答俄罗斯所关心的问题^①;也有人认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特殊的“俄罗斯理论”;^[3](P228-239) 还有人认为应该积极地利用西方理论概念和方法,因为“某个国家的研究独特性不在于学者们使用的工具,而在于他们要解决的问题。”^[4](P213-219)

然而,这些看似矛盾的观点其实存在某些共同点:由于当代国际政治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需要寻找抽象度更高的概念和跨学科的宏观分析框架。具体而言,当今世界的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全球化与区域化相互渗透的趋势增加了国际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导致国际关系发生本体性变化。因此,我们需要更新国际关系学的认识论基础,找到科学与非科学领域(包括哲学、神学、甚至普通意识)互动的有效机制。^[5]

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理论辩论的具体内容,即构建能满足新需求的“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哲学”两门新学科的尝试。

二、关于“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哲学”的理论辩论

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前沿体现在

围绕建设“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哲学”两门新学科的辩论之中。2004年至2005年,《国际趋势》^②和《政治学》等学术刊物围绕这两门学科的必要性、合理性和生成途径展开了一系列讨论。

“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两个概念原本享有同样的外延,然而,在近年来的理论讨论中,一些学者将世界政治的外延扩大化,主张将国际关系包容其内。俄罗斯学界的“世界政治视角”将对外和对内两个政策领域统一化,以国家决策的国内和国际视角的不可分割为原则。^[6]

“世界政治视角”为何会在俄罗斯成为理论辩论的重要议题?有学者认为这种视角承袭自前苏联,当时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所应用的方法(如事件分析、认知测绘等)主要分析的不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互动,而是影响国家决策过程的其他变量,比如社会因素和决策者的心理因素等。同时,一体化问题、国际谈判、环境问题、民主化和全球化问题也经常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这些研究的范围很宽泛,超出了国际关系学的领域,从而推动了世界政治视角的形成。^[7]也有学者认为,围绕世界政治视角展开的讨论与前苏联的研究风格无关。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教育改革之后,许多大学出现了以“世界政治”为名的研究机构和专业,2002年出版了第一本《世界政治》教科书^③,由此使得“世界政治”作为示范学科进入了学术议题的讨论。

这种现象在俄罗斯学术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建设“世界政治学科”的努力毫无疑问有助于俄罗斯政治学的发展。世界政治能提供集成不同理论假说的平台、创造大多数研究者能加入的共同概念空间,从而团结学术努力、推动理论知识的积累。^[6]但是也有人认为世界政治学

① 相关观点参见:Ахизер А. Можно ли понять росси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не исследуя его специфику? // Pro et Contra 2000, 5(4), С. 199-202. Фирсов Б. Дальние подступы к созд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социальной теории // Pro et Contra, 2001, 6(2), С. 171-177. Чешков М. А. Болезнь серьезнее, чем кажется // Pro et Contra, 2000, 5(3), С. 198-201.

② 参见网站 <http://www.intertrends.ru/index.htm>.

③ 代表性的著作参见 Лебедева М. М.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М., 2003. Ряд важных положений мир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одхода развиты в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удачной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работе, выполненной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А. Ю. Мельвиля, «Категор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М., 2002).

科是人造的学科^①,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新意,难以发展成为一个“新学科”。无论如何,梳理关于世界政治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俄罗斯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

博加图洛夫通过对比“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两个研究领域试图解决世界政治学科的理论定位问题。他认为,“世界政治”表明国际环境出现了一种新的状态,国家之外的许多新行为体参与到国际政治进程中。同时,由于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际空间发生了“浓缩化”现象。传统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不同国家对外政策的互动。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国际政治参与者的内部问题普遍成为它们互动的对象。^[6]

列别杰娃针对博加图洛夫所指出的行为体多元化提出质疑,认为关键问题不在于当前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多元性,而在于这些不同的行为体如何互动。目前的行为体同时具有诸多方面的不同点:资源的不同(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智力资源等),目的的不同(永远存在的、长期存在的、短期存在的)等。同时,把握不同资源组合和具有不同生存目的的行为体参与不同类型的关系(国家与国家、国家与非国家、非国家与非国家),并且相互影响。这一切削弱了国际行为体的可比性以及预测它们关系的确定性,导致国际政治学因果链条的复杂化。我们很难将世界政治视为一个整体,不同理论流派只能分析国际政治的不同侧面,但是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有效地结合不同理论流派的视角和分析方法。“世界政治”被视为能完成这种任务的新学科。^[8]

齐甘科夫也加入到关于世界政治的讨论中,与博加图洛夫相同,他的论点集中于“世界政治”的新特质。齐甘科夫提出了静态性特质和动态性特质两类特质。^[9]在他看来,“世界政治”的静态性特质包括以下六项:(1)全球维度,“世界政治”所代表的现象和过程具有全球性;(2)权力维度,影响关系和权力关系是决定世界

政治发展的主要因素;(3)结构维度,出现了不同数量和质的新行为体;(4)体系维度,“世界政治”是具有整体性的现象,其总体性质不等于组成部分性质的加合;(5)社会维度,世界政治指全球性的社会空间,不同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追求具有全人类的政治意义,任何社会问题也是世界政治的问题;(6)组织维度,传统的互动规则、原则和规范经常出现故障,但是新的规则、原则和规范还处于形成阶段。从动态角度看,世界政治存在对外和对内政策领域混合化和政治生活复杂化、国家主权弱化、权力关系转变以及全球治理与国际公民社会的形成等趋势。齐甘科夫承认,每一个静态特征是相对的而每一个动态趋势总会遇到相反的趋势。这种保留态度再次证明“世界政治”讨论的不确定性,但是有人认为,俄罗斯学术界出现“世界政治”讨论有助于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这是因为目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流在经历范式争论后进入了一个相互对立的理论流派的合流阶段,而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通过世界政治讨论则可能绕开“范式争论”而直接进入合流阶段。^{[10] (P71-89)}

在讨论世界政治学科的同时,“国际关系哲学”也成为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辩论的热门议题,围绕这一议题同样存在积极的支持者和强烈的批评者。

巴达罗夫(Э. Я. Баталов)于2005年出版了题为《论国际关系哲学》的著作。^[11]他认为,由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中层理论不能解释当代世界快速而深刻的变化,当代国际关系学求助于哲学是个必然。世界政治的发展和新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得学者从哲学整体论的角度看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哲学”能有效地解释国际环境变化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本质与来源,提供分析国际关系伦理的角度,从而为了解当代国际秩序的性质作出了重要贡献。

博加图洛夫也强调国际关系哲学分析的重

^① Персональные дискуссии автора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и с профессором Новиковым (本文作者与诺维科夫教授的交流,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2007年6月)。

要性。他指出,过去十几年里有两个趋势决定了哲学视角的重要性。首先是跨国化趋势改变了现代人对世界发展的认识维度,以及对其意义与后果的理解。其次是武力作为一种调整国际关系的手段重新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两个趋势涉及一系列哲学性问题:不同主体为什么参与国际互动?国际关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当代世界和俄罗斯的发展轨迹是否正确?国际关系中的牺牲和损失是为了什么?以及是否可以被接受?国际互动是否有规范性?如何开始讨论世界发展的前景、最终目标和代价?这些哲学性问题涉及其他更具体的问题:建设作为“原学科”(proto-discipline)的“国际关系哲学”是否可行?其研究对象如何构建?其与国际关系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如何联系?国际关系的哪些哲学方面目前最有价值?如何去研究它们?需要超越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关于权力优势、单极格局、霸权主义、民主帝国主义的观点。因此,对国际现实需要进行哲学分析。^[12]

阿卜杜拉耶夫(Е. В. Абдуллаев)认为,“国际关系哲学”可以为国际问题研究提供方法论支撑,并且提出了三个构建途径:(1)将国际关系哲学从其他相近的社会科学哲学中分离、拣选和合成出来。(2)从国际法哲学提炼出单独的领域——国家间关系的法哲学。(3)在哲学伦理和哲学方法领域里寻找。阿卜杜拉耶夫认为,要明确地区分国际关系哲学与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科学),国际关系哲学的主要目的是提出基本问题(但不一定提供答案),而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科学)的目的则是用现实事实回答国际关系哲学所提出的问题。^[13]

科索拉波夫(Н. А. Косолапов)讨论了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关系。他认为,当代国际关系学毫无疑问处于危机状态,其重要原因是缺乏明确的学科结构。一系列的国际关系理论假说不断涌现,每一个都抓住了现实的一面,但是缺乏维系它们的理论纽带。哲学层次理论、中层理论和纯粹应用理论等不同层次的理论不相符合。“国际关系哲学”能在哲学层次上将不同的理论联系为整体,将国际关系学科组织成“学科

树”,使不同理论成为具有内在逻辑树状结构的组成部分(就像物理、化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科学的结构)。^[14]

契什科夫(М. А. Чешков)认同国际关系学需要“哲学注入”,但未必将“国际关系哲学”作为单独的学科。哲学知识与科学知识不同,将国际关系哲学称为“学科”意味着要么把科学与哲学混合在一起,要么把哲学科学化。但是重要的却在于找到国际关系学与哲学相互联系和互动的机制。在近代科学中,不同的学科越来越多地相互交叉、渗透、借用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学科除了接受别的邻近领域的成就(交叉学科),也需要相关前提性知识(哲学和方法学)的补充。^[15]

也有学者怀疑讨论“国际关系哲学”的必要性。罗易斯基(Троицкий)认为,“没有必要建立任何‘国际关系哲学’,大家想出了一个新词,但是这种哲学对知识增长的贡献并不清楚。当然,有时候新的话语能产生新的知识,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和对大多数研究者而言,更有意义的工作是研究更狭窄但更有研究价值的具体问题。”^[16]

关于建立“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哲学”新学科的讨论体现了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现状。这种讨论的重要缺陷在于中层实证研究的不足,描述性的历史研究与高度抽象的理论思考缺少关联性。不过,最近俄罗斯学界逐渐开始出现试图结合实证资料与理论分析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国际趋势进行理论探索过程中产生的几个应用性概念。

三、对国际趋势的理论探讨

对于当代国际状况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俄罗斯学者并未达成共识。大多数学者不否认美国在国际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但同时提出迥然不同的解释。这一部分将集中阐述俄罗斯学者提出的新的分析概念,以诠释对当代国际趋势进行理论探索的俄罗斯视角,主要聚焦于“内嵌—聚结体”路径、“动态稳定论”和“国际体系的空间性结构”等

三个概念。

“内嵌—聚结体”路径主要挑战普遍接受的有关全球化趋势的理解。^[17]西方学者通常将全球化解释为当代世界不断同化的趋势。博加图洛夫和维诺格拉多夫(A. В. Виноградов)认为,西方学者的理解不能全面地体现现实过程的多样性,并且不能对俄罗斯的经验提供可接受的解释。

根据“内嵌—聚结体”路径,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特殊的“聚结体性社会”。在这种社会内,“传统”和“现代”两个源头形成可以并存但不相互消灭的两种“内嵌单元”。作为有效的个体,不同的内嵌单元继续稳定地发展,而在发展过程中保存它们在聚结体内的相对比重^①。聚结体性社会在当代世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它们能够限制西方全球化的扩张。博加图洛夫认为,聚结体性社会包括俄罗斯、中国、印度、日本等非西方国家。“内嵌—聚结体性”社会不一定落后于典型的西方社会,它们的发展方向也不一定是西方化。为了更全面地解释“内嵌—聚结体”路径,博加图洛夫和维诺格拉多夫分析了三对关系:“体系性”和“聚结体性”,“进步”与“共存”,“全球性”和“现实世界整体性”。

第一,“体系性”和“聚结体性”。聚结体性(conglomerateness)不否认体系性,但是两者的内在区别在于,它们内在单元间的互动模式有所不同。在体系性整体内,不同单元间的互动服从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即性质不同的单元进行融合形成新的体系性特质,但同时失去原有的子部分和特质。与此相反,在聚结体性整体内,不同内嵌单元虽然相互影响和接触但并不相互融合,也不通过失去原有的特质获得新的特质。比如,尽管在苏联时代的北高加索,俄罗斯、车臣和印古什的社会安排并没融合为车臣—印古什加盟共和国的“苏联社会安排”,但这三种安排在三十多年内曾代表同一个行政整体而并存。不同内嵌单元同时发展,但

不一定具有同质性;内嵌单元之间关联关系的变化使得聚结体本身也得到发展。

第二,进步和共存。根据博加图洛夫的论述,近代史上存在过的所有国际秩序都以欧洲为中心。进步总是被视为改造性的线性过程,经过发展,世界将成为价值观一致的世界。比如,根据现代化理论,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必须成为类似于西方社会的副本。但是,聚结体社会的长期生存能力以及现代化的实践经验使得学者们对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产生质疑。“现代的”日本、韩国、中国、俄罗斯,经历三百多年的现代化之后,并没有成为西方的复制品,它们仍然是包含“现代”和“传统”的多阶层结构,这种现象不能称其为“落后”。事实上,革新不能使聚结体社会成为西方样板的体系性社会。聚结体社会的每一个内嵌单元在经历革新后,都不会失去自身的“特殊性质”。被更新后的社会仍是以聚结体形式而存在,而不是被熔铸成内在均质的体系性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聚结体性社会可以获得新的宏观性特质,但其内嵌单元却会保留相互对立微观性特质的“临界量”,从而不相互淹没。

如果接受这种发展模式的逻辑,就可以从新的角度思考俄罗斯车臣、南斯拉夫科索沃、英国贝尔法斯特、土耳其库尔德斯坦等问题。在民族较为单一的聚结体社会,如日本和韩国中,用“内嵌—聚结体”路径解释发展模式有助于理解同一民族内的“现代”与“传统”行为方式的共存。基于聚结体社会不符合线性发展模式,我们可以提出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并存性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假定,在典型的线性发展模式“破坏性更新范式”之外,存在着“非破坏性”的更新范式,这种范式允许不同内嵌单元以非匀速进行独立的发展。

第三,全球性和现实世界整体性。全球性代表以西方文明核心为基础的被同化的全球共同体。而“现实世界整体性”虽然也反映国际政治的“整体性”,但更主张不同主体具有的特质性。根

^① 博加图洛夫认为,目前的社会分类以二元分类(传统和现代)为主。虽然有学者强调“传统”和“现代”的混合性社会(Andrew Webster,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an, 1984, pp. 57-62),但他们并没有将混合性社会作为一种固定的特殊模式来分析。

据“内嵌—聚结体”路径,尽管西方化和全球化发挥了塑造当今世界的作用,但未必是世界整体性的必要条件,也未必是不可替代的世界发展趋势。相反,按照西方标准(西方世界的规范经验和伦理)去管理国际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将增加国际冲突的风险。内嵌—聚结体分析路径可以更加具体地解释国际冲突的发生机制。

俄罗斯学者用来分析当代国际体系的另一个概念是“动态稳定论”。^[18](P145-171) 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国际稳定双面性的设定,即“稳定”既有静态属性也有动态属性,可以分为“静态稳定”和“动态稳定”。

理论上,静态稳定与动态稳定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待国际矛盾的原则上。在静态稳定状态下,相关国家尽量把导致相互矛盾的问题隔离起来,并排挤出互动议事日程。与此相反,在动态稳定状态下,相关国家在互动过程中更加强调共同利益。换言之,静态稳定的主要逻辑是最大限度地隔离两国在利益上相互矛盾的追求,从而避免冲突。而动态稳定的主要逻辑则是通过增加共同利益的追求而减小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静态稳定状态下,矛盾问题较为明确,因此国家的任何越轨行为都可能使矛盾爆发。在动态稳定状态下,国家允许相互间发生摩擦,但共同利益促进了国家间“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相对安全状态。这样的互动不是国际和谐的理想模式,但是它能产生“减压阀”的效果,帮助体系发泄出多余的压力,从而消除发生大冲突的危险。因此,根据动态稳定模式,国家之间有矛盾的领域和问题不一定要被隔离起来。动态稳定论的现实意义在于,国家领导人增加国际关系稳定的努力应该集中于扩大共同利益。

在现实中,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符合静态稳定的逻辑。这一时期的欧洲国际关系以及1962年至1985年的美苏关系都可以作为案例。具体而言,20世纪60年代第一个“缓和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巩固已形成的两极格局使国际政治稳定化,而稳定化的主要工具是苏美力量均衡和相互毁灭原则所造成的恐怖。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国和苏联签署了关于建立危机

管理机制的一系列条约,巩固了国际政治中的静态稳定状态。当时,美国和苏联之间关系的主导逻辑是尽量将导致矛盾的领域分离开来,两国的主要努力都集中于保持军事实力平衡和势力范围。如果出现直接对抗的危险,两国便讨论导致矛盾的问题和达到两方都愿意接受的妥协。换言之,第一个“缓和政策”的主要逻辑是尽量避免让两国相互矛盾的利益交织在一起。

20世纪80年代后的第二个“缓和政策”代表着国际体系互动走出静态稳定,开始显露出按照动态稳定规律运行的趋势。1985—1991年,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里根及老布什试图将美苏对抗性两极结构改造为合作性两极结构。为了实现这种目的,两国政府并没有把矛盾排挤在两国互动的议事日程外,而是开始扩大具有共同利益的合作领域。这就是第一个缓和政策和第二个缓和政策的区别。

博加图洛夫指出,动态稳定是国际体系在发展过程中适应动荡冲击的模式之一。国际关系历史可以被想象为动态稳定模式与静态稳定模式交替登场的变更过程,从而走出了结构主义研究的静态性。

博加图洛夫在《太平洋的大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空间结构”或“空间构型”的概念。^[19]他指出,既有理论在对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现实进行解释时显得捉襟见肘。理论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俄罗斯和国外学者认为,亚太地区不及欧洲稳定。但是,在现实中,自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东亚再没有出现过大规模国际冲突。一些地区性国际摩擦与波西尼亚战争、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战争或者塔吉克斯坦战争相比在规模和程度上都没有可比性。基于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博加图洛夫假设,在东亚地区形成了服从特殊逻辑和具有特殊结构特征的新型国际体系。他将这种体系称为“空间体系”,不同于传统的“极性体系”。^[19]

传统的“极性体系”以占主导地位的“领导国家”为基础。领导国家应当具有客观的能力,因此“极性体系”主要基于领导国家的绝对实力优势,其他“背景国家”的影响几乎为零。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一直到1991年雅尔塔

体系解体,国际体系的更替都是极性体系。而在“空间性结构”中,不同的“极”(如美国和苏联)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对国际事务施加决定性影响。同时,形成“空间”的“背景国家”的组织程度和关系的浓度达到了可以抵抗或压倒领导国家所发出政治信号的水平。换言之,“空间结构”的主要特点是国际空间的相对高密度性,这种现象表现为某个地区的中小国家形成相对的“集体领导”,^[19]并且直接地或者通过影响“领导国家”间的关系有效地影响该地区的状况。“空间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于东亚,这一时期中小国家的作用发生了变化。二战后的几十年间,这些国家只是作为东亚地区国际政治的背景存在,但是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它们变成这一地区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因素,其综合作用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它们经济、军事等实力的算术和。这意味着在亚太地区形成了更适应于保持稳定的特殊国际关系模式。

领导性/极性体系是组织“领导”的结构,而空间性体系是组织“环境”的结构。^{[20](P266-282)}在极性体系中,稳定的关键在于垂直性的等级化结构,例如在北约和华约对峙时期,国际联盟通过高度官僚化的体系进行决策。而在空间性体系内可以不存在这种等级化。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缺乏等级化,甚至《马尼拉公约》也缺乏明确的等级化的决策过程。

领导性和空间性体系内的国家行为有所不同。领导性/极性体系以线性关系为主,强大的“极国家”给其他“极国家”发出直接的信号,这种信号的缺乏会被视为国家软弱的表现。博加图洛夫认为,在极性体系内,为了表示对自身实力的自信,相对立的“极”经常虚张声势(常见于美苏两极之间)。在空间性体系内,国家间缺乏制度化条约的约束,相互影响多是非规范性的。国家宁可或不得不更多地依靠与别国的间接互动对国际政治施加影响。在空间体系内,由于潜在的敌对力量和合作伙伴的数量不确定,因此国家彼此时刻保持警惕,尽量避免承担明确义务。博加图洛夫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盟国家解决柬埔寨问题以及目前东亚安全对话也符合这样的逻辑。

“空间性体系”与“领导/极性体系”之间的上

述差异表明,体系的高度制度化本身不是保障稳定的关键条件,因此对国家理性政策而言,构建国际制度不一定是保证关系稳定的首要目的。非制度化的联系所发挥的冲突缓冲效果并不逊于甚至超过高度制度化的体系。非制度化联系实际上是另一种组织关系的手段,在这种联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行为主体不是领导国家,而是形成背景空间的中小国家。

总之,在空间性体系内,“空间”或者说“环境”因素成为分析国际互动的重要变量。领导/极性体系仍然是国际稳定的主要因素,但并非国际关系的通则。当今国际体系的演变使得学者们试图超越领导/极性体系的框架,在这一方面,区域研究将起到关键的作用,将区域研究的成果投射到更广泛的国际趋势研究将对国际关系一般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四、结 语

通过分析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发展现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俄罗斯国际关系学还处于形成阶段,任何理论分类都是相对性的。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当前俄罗斯主流的国际关系流派是现实主义,然而俄罗斯学者的现实主义路径并不一致,它包括了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研究风格和理论探索。对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影响最大的研究传统是历史政治学。

其次,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重要特点是“世界政治”的分析视角。其主要目的是融合国际关系学不同的分析方法,使它们形成“世界政治”的新学科。建构“世界政治”新学科的尝试主要是由于全球化导致国际环境的性质发生变化。

最后,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发展的主要阻碍是对实证案例研究的缺乏,更流行的学术活动是在西方文献的基础上创造出“关于理论的理论”。这种趋势的负面结果是,理论知识难以被用于实证资料的分析。尽管如此,俄罗斯学者仍然提出了一些有创意的分析概念。在发展新概念的过程中,区域性研究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区域研究领域,通过处理大量的“非西方”实证资料,一些学者

得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其中包括“内嵌—聚结体”路径、“动态稳定论”以及国际关系的“空间性结构”。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些研究的主流方法是系统历史学。这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国际问题分析的俄罗斯视角,同时反映出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寻找自身位置的曲折过程。

参考文献:

- [1] Богатуров А. Д. Тради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еализма в те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России [А]. Кокошин А. А., Богатуров А. Д.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теория,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прикладной анализ [С]. М.: Э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2002, глава 7. (available at: http://www.obraforum.ru/Mirovaja_politika/titul.htm)
- [2] Богатуров А. Д. Десять лет парадигмы освоения [J]. Pro et Contra, 2000, 5(1).
- [3] Кустарев А. Запад и 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J]. Pro et Contra, 2001, 6(3).
- [4] Радаев В. Есть ли шанс создать российскую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теорию в социальных науках [J]. Pro et Contra, 2000, 5(3).
- [5] Чешков М. А. Понятие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общенауч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 [J].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роцессы, 2004, № 3. (available at: <http://www.intertrends.ru/sixth/012.htm>)
- [6] Богатуров А. Д. Понятие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дискурсе [J].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роцессы, 2004, № 1. (available at: <http://www.intertrends.ru/four/002.htm>)
- [7] Лебедева М. М.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ее развитие в России [J]. Космополис, 2004, № 2(8).
- [8] Лебедева М. М. Предметное поле и предметные поля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J].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роцессы, 2004, № 2. (available at: <http://www.intertrends.ru/five/008.htm>)
- [9] Цыганков П. А.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ее содержание [J].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роцессы, 2005, № 1. (available at: <http://www.intertrends.ru/seventh/005.htm>)
- [10] Цыганков П. Либер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те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J]. Космополис, 2003, 4 (6).
- [11] Баталов Э. Я. О философ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 М.: Научно —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форум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отношениям, 2005.
- [12] Богатуров А. Д. Философ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есть ли должна быть? круглый стол [J].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роцессы, 2004, № 1. (available at: <http://www.intertrends.ru/four/005.htm>)
- [13] Абдуллаев Е. В. Философ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есть ли должна быть? круглый стол [J].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роцессы, 2004, № 1. (available at: <http://www.intertrends.ru/four/005.htm>)
- [14] Косолапов Н. А. Философ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есть ли должна быть? круглый стол [J].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роцессы, 2004, № 1. (available at: <http://www.intertrends.ru/four/005.htm>)
- [15] Чешков М. А. Философ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есть ли должна быть? круглый стол [J].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роцессы, 2004, № 1. (available at: <http://www.intertrends.ru/four/005.htm>)
- [16] Троицкий М. А. Философ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есть ли должна быть? круглый стол [J].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роцессы, 2004, № 1. (available at: <http://www.intertrends.ru/four/005.htm>)
- [17] Богатуров А. Д., Виноградов А. В. Анклавно-конгломеративный тип развития. Опыт транссистемной теории [А]. Восток — Запад. К 70-летию академика Нодари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а Симонии [С]. М.: Прогресс-Традиция, 2002.
- [18] Богатуров А. Д. Динамическа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А] Богатуров А. Д. Очерки теории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 Научно-образоват. форум по междунар. отношениям. — М., 2002.
- [19] Богатуров А. Д. Великие державы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История и теория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45—1995 [М]. М.: Сюита, 1997. Гл. 2. (available at: <http://www.obraforum.ru>)

[20] Богатуров А. Д. Среда - против лидеро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самоорганиз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А]. Богатуров А. Д. Очерки теории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 Научно-образоват. форум по междунар. отношениям -М., 2002.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IR Discipline and It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Alexander Korolev

(School of Asian Studies,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Moscow, Russia)

[**Key words**] Russian; IR; world politics; IR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trend

[**Abstract**]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Rus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study stepped into a phase of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where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ontent,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underwent substantial chang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surveying Russian IR discipline development since 1991, elaborating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in Russian IR academia concer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wo emerging disciplines of "world politics" and "IR philosophy", and as well, analyzing the new concepts advanced by Russian scholars when delving into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configuration. Thereby, the contemporary Russian perspectives of IR theory explorations are presented.

[责任编辑 刘蔚然]